

無能者的無能—— 1949至1951年的趙紫宸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一、前言

趙紫宸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神學家，其著作的學術分量，與在國際上的聲望，可說是無出其右。他也是中共建國前後中國教會的一位重要人物，被邀出任政協會議，參與《共同綱領》的制訂。在五位政府邀請的基督教界政協代表中，趙紫宸的聲望最隆。他的背景資歷，與包括吳耀宗在內的其餘四人異，他一直以學者姿態活躍於教會界，過往甚少參加政治或社會運動，鮮曾與中共接觸；並且他對共產主義向持否定的態度，¹亦沒有太早歡慶全國的解放。因此，他之被邀與願意被邀

¹ 晚至華北解放前一年多，趙紫宸仍在其著述中批判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做法。他說：「現在的共產主義尚不是政治的民主，尚是極權的統制，對於博愛平等自由種種用血價贖來的價值（筆者按：即基督教），是一種有力的壓制。所謂經濟命定論，不免是偏畸的思想，因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尚有其他的思想，願望與要求。所用的手腕政策，重鬥爭，只問目的，不問手段，使許多人覺得可怕。在許多人看，共產的勢力簡直是使人格傾覆，道德淪亡的魔道。」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8），頁29。

為政協代表，及在中共建國頭兩年多的教會改造運動中的參與，便成了饒富趣味的討論題目；而這方面的研究，對於我們了解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參加者的不同動機與想法，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²

林榮洪的近著《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³雖曾概略整理了他的神學思想；但對此時期他的政治抉擇及背後的各種考慮，卻未曾有充分的解說。⁴邢福增的〈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可以說是上乘的作品，對四、五十年代趙氏的思想，做了深刻的研究與闡述；他之判定「趙氏接納中共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對現實形勢與處境的轉變的反省，而非來自統戰的壓力」，⁵也是極具見地的說法。不過，筆者卻仍覺得他在疏理趙紫宸對教會與中共政權、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時，將兩者的微妙差異混淆了，令人誤會趙氏曾對共產主義產生過憧憬，及曾作過消解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間的理論矛盾的努力。因此，本文對此略作陳述，狗尾續貂，以為邢文的補充。

除了有可迴旋處外，撰寫本文尚有一個較私人的因緣。最近剛因兩本有關五十年代三自運動及吳耀宗的著述，被國內三自教會接連為文作政治性的攻擊，心情不免有些異樣。正思如何回應之際，因著備課關係，重讀趙紫宸在建國前後的言論，發覺竟與我在這些年間所曾說過的話出奇相似；而他之拒絕去國移民，並在1949至1950年間尋求與新政權建立溝通的渠道，所引發的種種誤會（被指為中共黨員），及日後漫長日子的悲慘命運，也教我忧心劇目。在惺惺相惜之餘，決定將趙氏的言

² 張賢勇曾批評海外研究三自運動的人，「往往容易將當時的中國基督教領袖群體看作鐵板一塊」。這個批評甚具見地。氏著：〈評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建道學刊》第6期（1996年7月），頁211。

³ 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

⁴ 這點已為不少論者指出過。參張賢勇：〈大音希聲——評林著趙紫宸傳兼論華人神學史研究的前景〉，《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十八期（1995年1月）；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建道學刊》第七期（1997年1月），頁139。

⁵ 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0。

論更好的整理出來，一方面豁現一代神學家的時代睿智，另一方面也突顯這位學者的時代悲劇，以誌紀念。

本文旨在整理趙紫宸於1949至1951年間，就是從華北解放到他被公開批判的前夕，所曾發表過的文字，從中窺探他在中共建國初年的生平與思想變化歷程：他如何從對新政權的猜疑與不信，到有限度地與政府及其欽點以吳耀宗為首的教會改造派合作，再到為教會改造派批判；他如何從積極推動教會作自保式的改革，提倡還原主義，到最後以受苦彌賽亞作為他及其他信徒的勉勵。基於篇幅所限，此時期所發生的無論是政治抑或教會的事件，皆只提其名稱而不交代其始末經過。至於教會改造派發起各個整治趙紫宸的政治運動的歷程，也得另文處理。

二、自保性的復原主義

華北解放後，趙紫宸與教會裡大多數對中共政權持不信任態度的基督徒一樣，對教會及個人的前途充滿疑懼。⁶ 他認同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革命有其正義性和必須性，⁷ 承認中共是得到不少人民擁護的；⁸ 但卻對共產主義的許多理論，及共產黨的極權作風不以為然，他亦對在中共統治下教會的生存空間深表憂慮。⁹ 雖然中共很早便宣示其對宗教的立

⁶ 這些疑懼不是無端的。即使是在1949年積極向教會領袖解釋中共的宗教政策、以安撫人心的吳耀宗，也承認中共在過去的解放區內，曾長期迫害基督教：「在解放區裡的基督教便遭遇到不少的困難。許多教堂、教會住宅、青年會和女青年會是被租借或被佔用；若干學校和醫院，或被接收，或改公立，或因經濟及其他困難而停辦。教會活動有時受到阻撓，或被迫停止；聖經有時被沒收；信徒有時被威脅，或受到必須放棄宗教信仰的暗示或警告。基督教人士，面對著這些事實，便感到失望、懼怕、悲觀；他們懷疑中共主張宗教自由的誠意；他們恐怕基督教在新政權下會遭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甚至不能存在。」吳耀宗：〈人民民主專政下的基督教〉，《天風》第8卷第4期（1949年8月20日），頁44。

⁷ 趙紫宸在1948年出席普世基督教會協會在荷蘭舉行的成立大會上發言時，指出：「中國文化崩潰了，現在正有一個大革命進行，我們不能不同情，因為有人不能參加這個革命，有一般人則替他們革命，他們是為人民的福利，我們不能不同情。」趙紫宸：〈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動向〉，《天風》146號（1948年11月13日），頁5。

⁸ 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Christian Century* 66:9 (March 2, 1949), 265.

⁹ 也許是基於恐懼共產黨的理由，他那位留學美國的兒子趙景德全家，便決定留在

場：他們容許宗教繼續存在，保障宗教自由；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展開對宗教的批判，並將矛頭特別指向基督教，後者被視為帝國主義利用來麻醉國人的工具，發揮鴉片的作用。趙紫宸視這個危機為中國基督教會前未遭逢的挑戰。基督教教會不過是一個細小的群體，能否戰勝這個來自政府的龐大挑戰，他本人並不樂觀。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趙紫宸對時局的反應出奇地內向。他幾乎不曾仔細檢視教會所面對的外在挑戰，沒有討論中共容許宗教自由的誠意，沒有刻意預估政府對基督教所會採取的行動（雖然他的許多悲觀預測在日後都不幸言中），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教會內部。他不容情地指摘教會存在的積弊，包括宗派林立，牧者與信徒間沒有連結成真正的團契，教會的屬靈景況低迷，福音力量不彰等等。他尤其感到憂心忡忡的，是教會領袖對時代轉變的不知不覺，一切依然故我，沒有因應外在的形勢而自我批判，改革教會內部那些與新時代不相應的思想和行為。趙紫宸認同教會裡那群激進學生的看法：「中國教會得重新建造她最低層的基礎。」

不過，與吳耀宗等（筆者權稱他們為教會改造派）不同的是，趙紫宸對基督教的理解主要不是個別的信徒，或抽象的基督教精神，而是具體實在的基督教會，他的神學是徹底的教會性的。¹⁰此外，他對基督教

美國不歸。即使四川地質調查所聘請他，而他應了聘，且接受了寄出給他的路費，結果也沒有成行。趙紫宸在1956年一次自我批判檢查發言中，辯稱他的兒子是「無緣無故地被美國扣留，不許回來」，又公開向政府與美國教會的正義人士呼籲，「你們幫助我使我的兒子和他全家早早回來。」《天風》第7期（1956年4月16日），頁23。

¹⁰ 他曾說過：「我們要明白基督教的真相，當然就不能不明白教會；不明白教會的真相而欲解釋基督教在世界上的進展，豈不是等於欲開電燈廠而不設發電機麼？要信教而不入教會，又豈不是等於欲在蒺藜上摘葡萄，在荊棘上採無花果麼？」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

他批評在中國不少人主張教會沒有存在的必要之說法，指出這個錯誤的觀念是由兩個偏差所造成的：第一，中國信徒缺少教會意識，既無訓練，又無關懷；第二，不少人出於傲慢的心態，以為可以自託於教會的附屬機關，如學校、醫院、文字團體，「就不再覺得有依恃教會的需要」。他慨嘆說：「曾經受洗入教的人，現在翱翔於教會的範圍之外的，在中國有幾何人？」明顯地，他所批評的包括了不少自由派的基督徒。諷刺地，他們竟然在五十年代成了中國教會改造運動的領導人。見趙紫宸：《教會的體用與其必要性》（上海：廣學會，1946），頁13。

教會在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時所應有的自我改造之看法，純粹是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¹¹ 他不但不曾主張教會必須向新政權或任何世俗思想靠攏，求同存異；反倒卻要求她重拾原已失去或淡化的福音精神，更堅持與世界有別的信仰理想。他相信中國基督教當前面對的政治挑戰，是來自上帝的審判，迫使教會自省悔罪，尋求更新。教會必須因應挑戰，進行下列的改革：

教會（抱歉這竟然是眾數）如今必須做以下四件事：（第一，）她們必須清楚自己所立的位置，不就信仰作任何妥協。（第二，）她們必須竭力促成內部的更新，掃除一切偶像崇拜、世俗化、假冒為善、分裂、無知，及昏睡的眼、不冷不熱的心，在基督的身體裡，藉著自我批判、悔改及靈性的重生，創建一個相愛的、沒有階級的團契，挑旺她們的熱情，以建立一個真正社會性、也因此是屬靈性的群體，須知道沒有這般內在的轉變，外在以具體行動的彰顯是不可能的。（第三，）她們得立即共同籌劃一個具體可能的社會服務計劃。還有，（第四，）她們必須革新她們的組織、神學、生活方式，及傳福音的方法。¹²（括弧內的字為筆者所加）

單從篇幅分佈，我們已可看到第二點才是最主要的講論。此時趙氏對教會前途的思考，大抵皆集中在靈性更新這條線索之上。他深切認識到教會內長久存在著各樣黑暗、腐敗等現象，又認定這些負面現象是導致她失去見證能力、難以植根於中國的禍根；因此若不正本清源，自我完善，單單討論外在的時代挑戰，是沒有意義的。她必須自我革新，除去靈性復興的所有人為障礙，教會方有回應挑戰——不管這是甚麼挑戰——的能力。

甚麼是靈性復興的「人為障礙」呢？最低限的說法，教會存在的一切積弊，諸如「迷信、偶像、躲避現實的罪惡等等的問題」，「包辦、

趙紫宸斷言：「教會之外是沒救法的。」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50），頁1。

¹¹ 有關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參筆者：〈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收《吳耀宗三論》（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頁47及後。

¹²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9:11 (June 27, 1949), 83.

買辦、不民主等等作風等問題」，¹³ 均是福音能力的障礙。但進一步，由於趙氏相信教會的因循苟且、一成不變、僵化自滿，難以回應一個動態的、劇變的時代，也是問題的所在；故「人為障礙」亦可以擴大為教會的一切建制，包括教義、禮儀、組織等。這些東西構成了基督教的文化與歷史包袱，使她無法因應時代的需要而轉變。令人詫異的是，受過正規西方神學訓練的他，竟然和應了王明道、倪柝聲等本土教會運動領袖的復原主義 (restorationism) 思想，認定二千年來教會歷史所有的發展，包括教義與禮儀等，皆是人為的、偶然的、歷史的產物，與基督福音無必然關係，甚至構成福音精神彰顯的障礙，故此盡皆可棄。¹⁴ 他說：

所有的信約 (creeds) 皆是人為的、且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與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所有的組織與不同的神學發展亦無不一樣。在目前華北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情況下，基督徒得有足夠勇氣將福音和教會與這些歷史的關聯斷開，改變（福音和教會的）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外觀，也將那些摻雜在基要的基督福音內的外來因素除去，務使基督教無論在教內或教外，皆顯出其簡單有活力。換言之，中國基督徒必須有創意，不怕讓基督教遠離其在母國教會的樣式。¹⁵

當然，趙氏這個復原主義的說法，只是為了教會自保而作出的。與王明道等不同的是，他並非認為二千年來一切歷史的建構皆是錯謬、與福音精神不兼容的；卻只認為它們是偶然的，與福音無必然的關係，即使放棄前者亦無損後者。趙紫宸大概已估計到，在政權易手後，由於外在形勢的變化，無論是自願或被迫，教會都得經歷激烈的轉變，許多舊有形式與做法都要廢去。而最主要的不同是，基督教已失去西方列強的

¹³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收氏著：《用愛心建立團契》（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95年重印），頁2。

¹⁴ 他在1950年初再補充說：「基督教從西方傳到中國來，附帶著不少不相干的東西。我們不大容易分得清甚麼是基督教的本質，甚麼是西洋文化遺傳的附帶物。種種禮節、儀文、形式、象徵、規矩、條目；種種傳教的方法，迷信的風俗，以至於現代主義、基要主義等等的意識形態，都不是原始的基督教所本有的元素，與基督教的本質沒有重要的關係。」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7。

¹⁵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3.

政治屏障，且處身於一個對基督教不友善的政權中。如此，過去她所享有的權利，今天該已不能續享。以傳福音的形式為例，趙紫宸指出：嗣後中國教會再不會有基督徒將軍，用獨裁手法迫令大量人信教；再不能有大型佈道會、夏令營等聚會；也再不能以天堂地獄等言論來引誘或威嚇人入教。¹⁶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政府並未展開整肅教會的行動，尚未明例禁止大型佈道活動；趙紫宸卻已高瞻遠矚地預計，整肅行動是遲早要來的，這些事工必要停止。從此角度言，他對教會的政治前途之看法是悲觀的。

從生存的角度考慮，教會的文化與社會包袱當然是愈輕簡愈好，一方面可以靈活地因應時勢而調整自己，另一方面也不用瞻前顧後，害怕失去這個那個，或必須依賴外力的接濟。趙紫宸在此時期對中國的本土教派，包括耶穌家庭、小群及各種靈恩派讚譽有加，對無須外來援助、自立自養的農村教會亦推崇不已；卻毫不客氣地批評那些大城市裡的大宗派及大教堂。他問：「將自立自養的教會與依靠外援的教會比一比，那一種教會正在克服困難，有蓬勃的朝氣呢？」¹⁷ 他不再計較本土教派在神學上是否存在著偏差，不再就本土領袖沒有展開信仰的文化與社會對話而加以批評，單單強調這些無龐雜的教育與醫療事業，組織制度都非常簡單的本土教派，才是最能適應時代的變遷、讓基督的教會能延續下去。¹⁸ 他甚至期望，這些在中國土壤裡崛起與發展的本土教派，就是徹

¹⁶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4.

¹⁷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9。

¹⁸ 他在1950年9月說了一段透徹淋漓的話，值得在這裡全段徵引出來，以說明他在生存考慮下的復原主義思想：「基督教是放在瓦器裡的寶貝，這是怎麼講呢？請舉幾個例子來說。目前有許多人批評那些屬靈派，靈恩派，小群等的宗教狂，說他們的信心是不可理喻的狂妄，是全部違反科學的迷信。無疑的這些派別是守舊的，不科學的，不可理喻的，極其偏狹的。可是他們真的感覺到了人生最深最大的需要，接觸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真實。因為他們的文化水準低，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將聖經裡的記載，揀出幾處來，作他們的解釋。他們把那廣大無量的放在局部的具體的器皿裡。他們犯了理性上不少的毛病、他們把一種破碎的舊神學，一個千補百補不可再用的瓦器，拿過來裝著他們心靈上所得到的至寶。他們果然是懇切祈禱的，果然是蒙受聖靈的恩賜的，果然是熱烈地愛上帝愛耶穌基督，而彼此相愛的，果然是經過了心理上的變化的，快樂的，有希望的，行為上比較正直的。他們真能奉獻，為自己的需要而建造禮拜堂，不用洋錢，不必要洋人扶植，漸漸地形成了本地的，有土氣的宗教團體。批評他們的人最好慢慢的把話說盡；因為『上帝卻揀選

底奉行自治自傳自養的原則、與英美差會和傳教士全無關係、信仰形式既簡單又本地化的教派，可以成為基督教在新中國存活下去的模式。¹⁹ 趙紫宸的復原主義思想是實用性的，純粹出於生存的考慮。

三、悲觀而不消極

趙氏努力要成為一個悲觀但不消極的人。他認定即使失去所有大型佈道的機會，個人佈道總仍是可能的，亦是信徒不可或棄的，福音仍因此得以繼續傳播下去。教會不會因著失去某個傳教方法而無法存活。如此，他一方面以復原主義理論來合理化這個轉變，刻意貶低那些要放棄的東西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為自己及其他人作捨棄的心理預備；另一方面更期望教會迎向這個必須轉變的趨勢，主動地放棄次要的東西，化消極為積極。

在趙紫宸的心靈深處有這樣的信念：福音本身具有不被征服的生存能力，可以克服一切外在的侵擾，可以適應任何一個時代。²⁰ 他提到教會必須對歷史有所了解，特別是從教會歷史裡出現過的眾聖徒、使徒、英雄人物與殉道士身上學習，看看他們如何處應及克勝各種危機，從中得到教訓與鼓勵。²¹ 基督徒不用懼怕時代轉變，也不用擔憂時代轉變會

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總而言之，有寶貝呢，放在瓦器裡也是可以的；沒有寶貝呢，雖然有金櫃玉匣，也是徒然的。」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真理與生命》第15卷第3期（1950年9月），頁2。

¹⁹ 趙紫宸讚賞山東馬莊的耶穌家庭，指「在那裡有活的教會，活的教會裡所講的，一方面帶著些中國儒家道家的氣味，一方面由聖經的指示說屬靈的話。」他為有人批評他們挾帶迷信、包藏異端而辯護，指出所有具活力的神學家都有異端與迷信的成分。他最後斷說：「中國教義神學的命根子就在那裡長著。」換言之，在趙氏眼中，這種形式的教會是中國神學未來的出路。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金陵神學誌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頁18~19。

²⁰ 他說：「我們必須曉得，惟有基督教是救世惟一的宗教，惟有基督教教會是集合人類，創造和平，保障人生惟一的機構。國家有興亡，民族有盛衰，主義有隆替，文化有生死；惟有基督的身體——教會——要永遠窺存。」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32。

²¹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3.

否導致福音或教會的消亡。他們只該忠於所託，在每個時代做好彰顯福音精神的本分，尤其切要的是勿因自己的失誤，而使福音的見證能力受虧損。

趙紫宸甚至說出了一番大膽的、跡近大逆不道的話。他宣稱教會當前的福音使命是回應馬克思主義及向共產黨人作見證。他勸導基督徒不應過分刻板地看共產黨人，視他們為洪水猛獸或無法轉變的頑石，事實上他們與基督徒一樣，都是脆弱可變的。在革命時期，他們會推行較激烈的政策，也會篤信唯物論及共產主義其他理論；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的思想因此便無法轉變。特別是在他們掌權以後，由於他們要統治絕大多數非共產黨員的國民，而他們最大的關懷又在於實現中國的富強與進步，乃不得不因應現實需要，而調節他們的想法和策略。²² 他們會不斷地修正共產主義，有一天甚或會成為相對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者」呢！所以，基督徒若秉持福音精神，並有創意地調整他們的教會組織、傳教方法、神學思想與生活方式，他們將可與共產政權和平共處，繼續彰顯基督的愛。趙紫宸深信基督信仰的至終得勝，不少共產黨人會放棄他們的信仰，轉而投向基督教。他說：

共產主義太狂熱亦太自信，是不好應付的。但在這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一切皆可轉變；浪漫思想會沉寂，人類罪惡與自私的鐵般事實，及他們對靈性救贖、呼求在基督裡的上帝的需要，將教這些一度是狂熱份子的人睜開眼睛。這個時間必將來臨，並且該不會太遠了。那時將會有不少共產黨人叩教會的大門，要求進來接受救恩。不過，恐怕那時的教會仍與今天一樣，未能應付這個龐大的需要。²³

正當教會面臨重重危機之際，趙紫宸竟然說出這番狂話，除了顯示他對福音大能（而非教會組織）的強烈信念外，也表示他仍不曾見風轉舵，主張以共產主義取代基督教，作為人類的拯救。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與四十年代中期相較，並無太大的變化。

²²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265.

²³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5.

四、對政治現況稍覺安心

1949年年中，即北平解放後半年，趙紫宸寫了一篇文章："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一方面報道了政權易手後社會的一些變化，特別是對基督教會的影響；另一方面亦就這些變化，作出個人的神學反省。

趙紫宸在文中描繪了一幅較為令人安心的圖畫，基督教在新中國首半年內，大致仍未出現任何負面的變化，一切宗教活動如常舉行。這似乎應驗了他較早前的期望，就是中共會忙於應付軍事的行動、訓練工作人員及舉行各項會議，因此無暇理會教會的事務。²⁴

他提到政府最近召開一次高等教育會議，燕京大學三位教授被邀參加，其中兩位是基督徒；會中委出一個委員會專責處理私立學校的（包括教會學校）問題，會議決定教會學校的宗教選修科目仍可開設，甚至燕大的宗教學院亦可維持；只是大學頒授的神學士學位不被承認。由於國民政府在過去亦未承認過神學學位，故談不上是新的變化。這次會議所顯示的不僅是政府無暇插手教會事務，而是更積極的：中共有維持宗教自由的誠意，容許宗教在大致不變的情況下繼續發展。

他又提及吳耀宗與沈體蘭兩人在政權交接的過渡期間之特殊作用。²⁵ 在吳與沈的主導下，北平的教會領袖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基督教

²⁴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5.

²⁵ 今天的三自教會領袖大多強調趙紫宸與吳耀宗等的親密關係，筆者對此略持保留態度。就算他們二人私交甚篤，在四十年代，他們無論在神學思想抑或社會參與路線，都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趙紫宸在1948年所寫的一篇文章，正面批評當時期的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完全忽略了基督教信仰的特殊性，單單跟著當時期政治化的學運主流跑。他說：「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素來缺少深刻的宗教力量。人可以拿『本耶穌的精神』幾個字作幌子，竟亦可以完全不知道這些甚麼。學運的分子每逢聚集，總談社會政治經濟男女等問題，很少注重到基督教信仰，教理，教會，崇拜，聖徒生活等問題。做領袖的，不是人文主義式的耶穌的從者，便是專重社會服務的演說者；不是抱宗教主義的唯物論者，便是推動目標不清楚之工作的幹事。宗教原不過是幌子，並沒有內容。當然學運要與教會完全脫節。」以上一段說話的內容，設若不是針對（或部分針對）青年會，及青年會激進的幹事代表吳耀宗，則我只能說趙氏是在無的放矢了。趙紫宸：〈基督教學生運動有方向麼？〉，《消息月刊》第19期（1948年4月25日），頁3。

與新政權間的有關問題，這次會議大概是為即將召開的政協會議籌備會作預備的。正是在不多久以後，吳耀宗與趙紫宸聯繫，邀請他在新政權下扮演政教聯絡的角色，成為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²⁶此時期，吳耀宗等在新政權的特殊政治地位與功能，已廣為人所知曉。²⁷趙氏指出，由於吳等二人過去一直支持共產主義，故深獲中共高層取信。他相信他們會扮演政府與教會之間聯絡人的角色。不過，他很快便將看到，吳氏等絕非僅是聯絡人的角色。

此外，1949年5月，在政府支持下，青年會與女青年會共同召開一次大型的青年會議，兩會各派兩位同工主持。趙氏在文章中沒有直接說明會議的主題，及那四位講者的講話內容，卻說了這麼一句：「這四人都很能幹，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陳說當前中國青年的需要。」²⁸趙氏雖然不相信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整體上可以兼容，但卻認為它們在個別的課題上，「尚有調劑的可能」²⁹，因此他對調和兩個思想的衝突之任何努力，都表示歡迎。

趙紫宸在下述兩個事件中，提到當時教會內對政權回歸存在著分歧的看法，及因此產生關係上的隔閡。1949年2月，當解放軍進入北平城

²⁶ 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於1949年6月於北平舉行，吳耀宗、沈體蘭與鄧裕志代表基督教界參加。由於中共不曾認可任何全國性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選派代表出席政協，故基督教代表乃由吳耀宗等提出，在籌備會中確定。雖然代表名單要到九月才最後落實，教會且曾就某些代表的代表性發生爭議，但趙紫宸在此五人名單中，其代表性應是最少受到質疑的，故大概不是日後產生爭論的對象。筆者估計，吳耀宗對趙紫宸的邀約應在政協籌備會之後不久，即在七月間。

邢福增指中共是鑑於趙氏在國內外基督教界的崇高聲譽、深具統戰價值，才將他列入名單中。這個說法再正確沒有了。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基督教界的代表名單是由吳氏擬定的，只有他——而非中共——才知道誰該是基督教界中被統戰的對象啊。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4。

²⁷ 筆者在一個研究中指出，吳耀宗早在1949年1月，已為北平的中共新政權委託，負責對基督教界的收編與改造事宜。他是中共最可信賴的基督教內線人物。參筆者：〈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頁24~26。

²⁸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Christian Century* 66: 37 (Sept. 14, 1949), 1067.

²⁹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29。

時，燕京與清華兩所大學、包括宗教學院好些學生，曾到各教會及教會學校宣傳共產黨的宗教自由政策，安撫民心。不過，卻有人懷疑他們是由共產黨派來的人，旨在為新政府收買人心。可以想象，這是一個陰謀論滿天飛，牧者與信徒間彼此不信任，互相猜度對方的背景、估量別人言行之真實動機的時期。出於趙氏本人一貫良善的性格，他不同意上述的懷疑，卻認為這些學生只是出於愛人及愛上帝的心，才會從事這樣的工作。

而在三月上旬，教會領袖亦參加了一次為期三天的退修會，主辦單位可能是燕大宗學院。據趙氏的說法，沒做多大宣傳，已有百多位傳道人參加，顯然他們非常關心教會的前途，希望從長者或同工那裡得到某些指引。趙紫宸是這次大會的主要講員，他所講的題目包括：「唯物主義與基督教」、「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基督徒的歷史觀」，都是關於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分歧的疏解之道。趙氏坦承：「在保守的領袖眼中，我也是個受質疑的人物。」

趙紫宸在這一系列的講演中，有幾點反思是頗有意思的。

第一，他回顧政權交接前後，基督教會裡普遍出現的恐懼心態，不少人擔心中國教會無法在新政權延續下去。他個人當然也不例外。趙承認，他除了對新政權感到憂慮外，兩年前甚至有預備殉道的念頭。不過，最近他倒有新的想法。他問：為甚麼一個僅能活上數十寒暑的人，有資格擔憂中國基督教的前途呢？中國教會的前途乃在永遠得勝的上帝手中，故亦只由上帝負責。基督徒所應關心的是他個人的前途，就是他是否忠於基督的託付，活出信仰的要求。

趙紫宸雖然亦對共產政權之容許宗教存在懷抱期望，但他卻將最終盼望置放在上帝身上。他確認所信的上帝是統治萬有的，「一切反對祂不信祂的勢力也都生活在祂的管理與容許之下」，因此「基督教是在患難裡發展的宗教，有上帝的旨意必定勝利完成的信仰」。³⁰ 外在的壓力

³⁰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5~6。

愈大，教會愈倚靠上帝，上帝的大能便愈見彰顯。³¹這是一個超乎現實的信心和盼望。

五、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無法兼容

第二，他提到最近一些經歷讓他看到同時是基督徒與共產主義者的可能。先是不久前，6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有關傅連璋醫生的報道。傅連璋是一位基督徒兼共產主義者，曾在紅軍從事醫療服務十年。而在基督升天日前一晚，趙氏又與一位基督徒兼共產黨人懇談，趙建議翌日聯袂到教堂領聖餐，後者欣然答允。在這次奇妙的經歷後，趙紫宸反思道：

與一位身穿共產黨人制服的人共同跪領聖餐，讓我的心靈眼睛豁開，看到未來的一個新的可能。這個經驗使我的心充滿感恩，卻沒有令我驚訝，因為我早知道，我們中國人是個溫和、理性、實用與非哲學性的民族，故我們並不認為馬列主義思想與基督信仰是無法相容的。一個基督徒共產主義者並非不可能存在於我們中間。就如初期教會亦面對聖經記述與希臘哲學無法兼容、但事實上卻又以奇特的形式結合一樣。³²

筆者相信，趙紫宸這段說話及背後經歷的含義是，一方面他仍貫徹其早自三十年代便有的看法，即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是不能兼容的，³³兩者必然互相排斥，衝突無法避免；³⁴但另一方面，他卻仍心存一線僥倖，暗自期望理論上的不兼容不等於事實上的無法並存，特別是中國人是個實用主義的民族，秉持原教旨主義思想的人不多，故也許基督教能與共產主義並存，甚至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呢。

趙紫宸沒有因應政權的轉易，而詳細探討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相關的理論課題，他只是略為提及，必須在此時期建立「本土神學」：

³¹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1。

³²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

³³ 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51～152。

³⁴ 他在1948年5月仍主張，基督教當「與最有勢力的唯物論相競，而當仁不讓」。趙紫宸：〈漫談神學〉，《真理與生命》第14卷第3期（1949年10月），頁10。

此時應是恰當的時候，讓中國產生本土神學，內含創造理論、歷史哲學、人生觀及基督的救贖方式。這種神學若果真能出現，無須是——亦不可能是——一套系統，但得與中國文化及馬克思主義的動力內在論 (dynamic immanentism) 產生關係。這是一個關乎此三方面的事務。³⁵

要是筆者沒有解讀錯誤，這段說話的意思是，趙氏一方面主張基督徒必須積極地與當前中國的主流思想：共產主義對話，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動力內在論）；³⁶ 但另一方面，他卻又不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可以連結成一套和諧無間、首尾一貫的系統。³⁷ 他在下文甚至曖昧地提到，教會不應懼怕因著與共產主義對話、創建本土神學，而成為異端。可見在他的心底裡，原裝正版的基督教是無法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的。

在1950年的一篇文章中，趙紫宸略為論及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異同。他承認「自科學的觀點看，馬列的思想有作用，有正確性」；但他拒絕馬克思主義之指宗教思想是上層建築或意識形態的說法，亦不同意基督教純粹是唯心的。他認為宗教有其自身的範圍，是別的學科或學說所無法處理的；基督教所描述的同樣是關乎真實的、客觀的存在。趙紫

³⁵ T. C. Chao, "Christian Churches in Communist China," 85。筆者對這段話的翻譯與解釋，均不同於林榮洪。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頁294。

³⁶ 邢福增曾探討過 "Marxian dynamic immanentism" (他沿襲林榮洪的譯法) 一詞的含義，指出：「這顯然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或許是指某種不強調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參氏著：〈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1。這說法未曾捉到趙紫宸的要旨。筆者相信，這個詞的「動力」便是馬克思等所強調的辯證運動，無論是自然抑或歷史的；而所謂「內在論」的意思，則是上帝內貫於人類歷史的進程中。趙紫宸在此主張，基督徒必須參考共產主義的歷史主義觀點，視上帝及祂的旨意內貫並昭顯於人類歷史動態且辯證發展的過程中。

趙紫宸不可能沒有讀過類似吳耀宗在《大時代中的上帝觀》的說法：「因為上帝的旨意是在歷史中運行著的，因為歷史的進行，無論是怎樣曲折難測，至終它是要彰顯上帝的旨意的。唯物論者是根據辯證法的演進：對世界社會的改變，下一個實質與我們相同的結論。」吳耀宗：《大時代中的上帝觀》（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頁11。

³⁷ 筆者不同意邢福增的解讀，他認為趙氏的意思是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不僅不是水火不容，反倒是可以協和與結合的」。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61。

宸相信，在為人類謀求解放的革命行動上，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有著相同的社會理想；但是，雙方在理論上的不協調處，也不必強求調和：

真正的新思想是有革命性，歷史性的，要求著人民大眾的利益，要求著無產階級的實現。在這些方面，基督教的本質是與他們完全相同的。中國的神學要在世界觀歷史觀裡強調這些思想的成分。八十年前基督教的神學家接受了天演論的挑戰，吸收了由猿變人的理論，而建立了一個演進的創世觀。到了今日，中國的神學工作者難道不能進一步，接受共產主義的挑戰而建立社會主義的神學麼？不能調和的，我們不必強求調和，必得獨立的，我們應當保存其獨立。假的不因我們的努力而存在，真的必不因我們的無能而消泯。³⁸

第三，在談到教會當前的危機時，趙紫宸一方面承認教會存在著許多困難，特別是不少領袖離去，財政短缺等；但另一方面他卻認為，教會應能克服種種試煉生存下去。因為「中國人民（筆者按：這個詞的意思應是指新政府）不會完全忘記過去教會在文化、社會更新及歷次政治革命中所作的明顯貢獻。」³⁹他認為，中國教會有權活下去。「如今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力量站起來，承認過去為救亡圖存的緣故，曾偶然站在反動力量那邊，沒有公開批判蔣、孔、宋等家族及基督信仰中的猶大，也誤會誤傳了革命中正義的一方。這是她的罪惡與過失。」⁴⁰趙氏總結說：

³⁸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7。

³⁹ 趙紫宸曾多次提到基督教對中國的貢獻。譬如：「平心而論，基督教教會在我國也已經有不可磨滅的功勳。最先介紹西方文化的是教會，最先開辦新教育的是教會，設立醫院的是教會，提倡自由平等，民主民權，而間接直接影響中國的政治社會革命的也是教會。西宣教士冒險長征，來到中國，辟迷信，攻惡俗，提倡女子放足，提倡止淫禁賭，絕鴉片，反對婢妾制度，與老百姓接近，與士大夫交遊，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不過，他認為以上這些還只是表面的貢獻。基督教對中國真正的貢獻，在「引領人們歸向上帝，信從耶穌基督而做新造的人」。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頁18。

⁴⁰ 趙紫宸對共產政權的正義性，倒是有相當的認同。他以基督教會被排斥在中國革命運動以外，甚至成了革命的阻力，而深感遺憾。他自責說：「基督教應該是與一切為人民大眾求解放、求安全、求福利的運動一致進行的，為甚麼反被視為人民的鴉片呢？原因不在於外界的抨擊與批判，而在於基督教教會內部的錯誤與罪惡。」趙紫宸：〈本刊的話〉，《真理與生命》第15卷第1期（1950年3月），頁1。

中國基督教會必須了解到她真正的敵人不是在教會的外邊，並且她的未來也不是由她以外的某些敵對力量所決定，而是取決於她對基督及其福音的忠誠與否……因此，教會現今最首要及基本的任務是悔改 (reconversion) 及更新 (revitalization)。她要首先成為上帝真正的教會，一個愛和受苦的團契，其中每個成員都願意愛和服侍他人。⁴¹

當時教會裡有許多人探討教會在新時代可以有的貢獻。但對趙氏而言，這不過是次要的問題。中國教會真正且急切需要的，是悔改與順服。

最後，趙紫宸也談到中國教會與海外教會的關係。他斷言中國教會作為一個年輕的群體，在各方面仍待傳教士的支持，傳教士是不可或缺的。延至1950年初，趙紫宸仍不認為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有彼此勾結的關係，不同意大多數來華的傳教士都是旨在侵略中國的。就算基督教在實際效果上產生了鴉片的作用，也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在傳教士頭上，而必須同時看到中國基督徒所得承擔的責任。就中國教會接受西方差會財政資助的問題，他一方面駁斥那些陰謀論的說法，指出這些金錢都是出於西方信徒愛心的捐助，不會「有甚麼不良的動機與作用」；另一方面亦同意中國教會必須及早自養，因為他感受到美金的援助有一天是會停止的。⁴² 必須指出，趙紫宸這個想法並非是特殊的，吳耀宗在此時期也有類似的看法。⁴³

他主張中國教會繼續與海外（包括英、美教會）維持密切的聯繫。曾有傳教士跟他說，他們沒有向共產黨傳福音的責任，故在北平解放後便決定離開中國，趙氏反駁說：若是這樣，那中國就沒有人需要相信基督了。不過，趙紫宸坦承，由於過去，特別是美國的教會一直站在國民政府那邊，又採取反共反蘇的政治立場，故在新中國難免會遭遇相當的

⁴¹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7.

⁴²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16，24~25。他曾提到：「我們要洗去一切帝國主義的嫌疑，也要保存教會的國際性。」（頁5）

⁴³ 梁家麟：〈中共建國前後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頁55~58。

困難。他呼籲全世界的基督徒，與他自己及其他中國基督徒一樣，都得轉換他們對新中國的看法。

如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溝通形式、新的事工工具、新的傳教方法、新的同工關係，以及對我們的信仰的新詮釋。⁴⁴

六、建國前後的政治參與

1949年7月以後，趙紫宸已獲邀參與全國政協籌備會議的工作，制訂《共同綱領》，籌組新政府，他對新政權的態度轉趨積極。《共同綱領》裡規定了人民享有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基本自由，容許基督教繼續原有的宗教活動，這令趙氏放下心頭大石，認定政府具有充分誠意維持教會的現狀。1949年10月，新中國正式成立，趙紫宸作為政協代表，發表一篇談話，歡慶新中國的誕生，並呼籲基督徒共同參與建設國家的工作。⁴⁵

1949年11月，吳耀宗、趙紫宸等五位政協代表，聯名發表一篇題為〈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的文章，說明他們成為基督教代表的經過。文章指出：

現在被選的五個代表，並不代表這些團體（筆者按：全國性的基督教團體），他們所代表的是基督教裡面與他們思想相同的一派力量……這一派的力量思想，究竟是甚麼呢？簡單的說，他們主張民主；他們反日、反蔣、反美帝國主義；他們接受新民主主義，接受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主張與共產黨合作；他們不滿於基督教的保守、腐敗和它與帝國主義、封建力量的聯繫；他們認為社會革命是耶穌的福音一個重要的成分，而這個成分，與共產主義的主張，是大致相同的。他們的這些思想，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他們思想的轉變，雖然有時間上快慢的不同，但他們所以形成今日的思想，是經過了一個相當時期的奮鬥歷程的。在國民黨統治時期

⁴⁴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1068.

⁴⁵ 趙紫宸：〈基督教五位政協代表的觀感〉，《田家》第16卷第6期（1949年10月15日），頁8。

中，他們當中有些人，是一直在黑名單上的，是天天受到特務統治的威脅的。⁴⁶

從內容及文筆看，這篇文章當出自吳耀宗的手筆，⁴⁷其中引文末句更是他的夫子自道。文中提到五位政協代表的共同性，筆者想這也只是吳氏個人的期望，因為其中許多地方並不適用在趙紫宸身上，特別是在反美帝國主義一點上，他在此時與政府及吳耀宗等的想法有懸殊的距離。因此，若用吳氏上述的說法來做為他們的公因數 (common denominators)，則他們不久便將發現，趙氏的異質性遠較其同質性為多。

有人主張，趙紫宸在1949年後，謀求與新政權合作，乃是因為他已改變信仰立場，接受了共產主義，⁴⁸或至少認為基督教在教義或理論上可與共產主義兼容。筆者不同意這個說法。邢福增的分析是正確的，趙紫宸在此時期接受的是新政權（共產黨）的現實，而非新政權所秉持的思想（共產主義）。⁴⁹他在1949年底到1950年年中，特別是政府尚未展開對教會連串的整治行動以前，對這個新政權存有相當好感。與國民政府相較，中共在建國初期確實顯示了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⁵⁰他相信

⁴⁶ 吳耀宗等：〈我們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經過〉，《田家》第16卷第8期（1949年11月15日），頁8。

⁴⁷ 這是他為甚麼將自己的名字放在五人聯署的第三位，並將趙紫宸擺在最前面。吳耀宗等：〈我們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經過〉，頁9。

⁴⁸ 張化認為：「趙紫宸、吳雷川、吳耀宗，先後都接受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他們的神學目標是為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生存尋找意義，也一直在指出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價值，希冀中國人接受基督，從而讓基督教植根中國。但由於他們接納的社會改革方案來自已盛行中國的理論，他們只是給這些理論加上基督教的名義……」筆者相信，這番話只適用於吳耀宗與吳雷川，對趙紫宸——特別是四十年代以後的他——全不適用。張化：〈基督教早期「三自」的歷史考察〉，收朱維錚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161。

不過，早在1949年，海外基督教會已有人因趙紫宸拒絕棄國他去、又與政府合作，而懷疑他是共產黨員。《天風》第7期（1956年4月16日），頁23。

⁴⁹ 邢福增：〈中共建國前後趙紫宸的教會改革觀〉，頁158～161。

⁵⁰ 趙紫宸：〈參加北京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感想〉，《恩友》第2卷第3期（1950年3月15日），頁1。

《共同綱領》確實保證了人民享有信仰自由，縱然教會在各地面臨著相當的困難，但與其向政府爭取擁有更多的自由和發展空間，基督徒不如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推行教會改革運動，藉以證明教會配得享受信仰自由。⁵¹

早在1949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因鑑中央人民政府將成立宗教事務委員會，不少委員便覺得基督教應成立一個全國性強而有力的行政機構，與政府的宗教機構聯繫協調，遂計劃召開一次全國基督教會議。趙紫宸是這次會議的一位熱心推動者。1950年1月，他在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表〈大會的任務和目標〉的演講，主張利用政權轉易這個大環境，發起教會革新運動。他認為：「這是中國教會的一個好機會——一個最好的革新時期。」⁵² 執委會決定全國基督教會議將以「基督教與新時代」為主題，於8月在北京舉行。2月，成立籌備委員會，分四組推行各項事工，其中革新計劃組由趙紫宸與江長川擔任正副組長。

此時期趙紫宸專心致意地推動教會的革新運動，並以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自況，指出：「路德馬丁以『因信稱義』為口號，我們現在要以『因愛心，建社團』來革新教會。今天，我們就是在形成一個因愛心而建立的社團。」⁵³

由於召開會議的目的是加強協進會在全國基督教的聯絡與統籌作用，並要成立一個全國性強而有力的行政機構，故顯然與政府欲扶立吳耀宗等教會改造派，以取代教會現有的聯絡機構之構想相衝突。在各種政治壓力下，「因客觀形勢的發展」，3月28日，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常務會議決定將大會延期，並主張在繼後的常務會議中，舉行「擴大籌備會議」，邀請更具代表性的人物加入。在第七次籌委會的常務會議中，曾

⁵¹ 趙紫宸：〈論信仰自由〉，《天風》第209期（1950年4月15日），頁1。

⁵² 趙紫宸：〈全國基督教會議的目標與任務〉，《協進月刊》第8卷第8期（1950年4月），頁4。

⁵³ 清芬等：〈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冬令會學習要記〉，《恩友》第2卷第2期（1950年2月15日），頁5。

建議將大會延至十月舉行。不料到了七月，在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常務會議的建議下，擴大籌備委員會宣布停辦全國會議，將這個預定召開的大會併入協進會在十月舉行的第十四屆年會中。⁵⁴ 會議既無法召開，趙紫宸的教會改革方案便亦失去一個全面介紹與推動的機會，他的失望可以想象。不過，作為身處北京的教會領袖，他該不會在七月才知道會議無法召開的；早在四、五月間，他已逐漸感受到來自政治的強大壓力，亦知道他的教會改革理想是難以借助協進會等機構予以落實了。

協進會在第十四屆年會會議上，宣告擁護吳耀宗等所推動的教會改造方案。自此以後，協進會淡出中國教會的舞台，而由政府扶植吳氏所發動的奪權運動，終於成功。

七、教會生存的關懷

雖然趙紫宸在1949年時提到要創建本土神學，但事實上，此時期趙氏所關懷的已非理論層面的基督教神學本土化，而是教會如何適切時代的需要，特別是如何面對一個動盪不安、對基督教不友善的政治環境。1950年以後，趙紫宸並沒有很積極地展開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對話，他也不曾期望基督教可以擠身中國思想與社會的主流。

趙紫宸對基督教在新中國的發展空間與機會，一貫持悲觀的看法。他深切體會到，在政權易手以後，即使政府暫時對宗教仍然採取一個容忍的態度，未曾正式禁制基督教的活動；但是，由於在過去百年間，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是與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相配搭的，這些因素一旦為中共改變了，教會存在的形式便得隨之變化，許多舊有的做法將要更改，固有的東西需要放棄，教會即將失去多重外在保障。⁵⁵ 譬如說，在1950年5月偕同十多位教會領袖與周恩來總理會晤以後，儘管他不同意周氏指傳教士利用財政援助來收買和奴化中國教會的說法，但亦了解盡力

⁵⁴ 〈全國基督教會議決停開〉，《天風》第10卷第6期（1950年8月12日），頁12。

⁵⁵ 他知道教會不能再繼續龐大的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事業，政府將要把這些東西接管過去。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67。

盡快自傳自養是教會必要走的路。現實主義的他，知道中國基督徒目下的實力，未足應付維持教會現況的需求，因此有些房產將因無力繳付地稅而被政府沒收。不過，他卻致力安慰信徒，說：

但是我們損失些房子有甚麼關係呢？在保羅的時代教會有大房子麼？我們若真正有基督，還缺少甚麼呢？我們若真正沒有基督，有了許多洋房住宅大教堂，還有甚麼意思呢？⁵⁶

他也提到那些主要倚靠美援的神學院（包括他工作的燕京宗教學院在內），亦將因為經濟支援可能斷絕而難以為繼。神學工作者得學習在沒有外款支持、教會貧乏的情形下空手辦神學。⁵⁷如此，他亦再難奢談在僅僅三年前所說的神學教育抱負，就是要網羅最優秀的人才，提供最優質的訓練，為中國社會與教會尋覓思想的路向了。⁵⁸外在的政治與社會形勢轉變了，教會無法不隨之而變化。

自中共建國以後，趙紫宸從未對教會的現實處境表示樂觀，他所見所聞、朝思夕想的，壓倒性都是負面的現象，在在說明教會正面臨嚴峻的考驗。他要向「消極悲觀，衰老頹廢」，「團契的不振作，空氣的沈悶，靈性的低劣，力量的淺薄」的教會說話，向她傳遞一個盼望與積極奮鬥的信息。而他本人的盼望與積極奮鬥的動力，完全是來自超越現實的信仰。

對趙氏而言，中國教會如今面對的是不斷失去的實況，她所要做的是在失去了這個那個之後，如何肯定自己的價值，保持存活下去的信心，因此防衛遠比進攻重要，反正也沒有進攻的可能。在1949年時，趙紫宸仍主張基督徒必須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發揮社會見證的作用；藉此證明基督教是入世的信仰，也好拉近其與共產黨人的距離，但僅僅一年後，他已發現這樣的主張是不可行的。因為政府根本不會容許基督教繼

⁵⁶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58。

⁵⁷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19。他寫這段話的時候，美援尚未斷絕，故僅是居安思危的考慮。

⁵⁸ T. C. Chao, "Train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37 (1948): 256-63.

續發揮社會見證的作用，過去由教會承辦的教育、醫療、救濟、文字事工等，都將由政府全盤接收。他悲觀地預言：「不出十年二十年，中國教會的任務只有崇拜，講道，栽培心靈，以及與這些事連帶的宗教教育。」⁵⁹（在日後看，這個預言還算是過於樂觀的。）這樣，教會還能談甚麼社會功能與見證呢？

因此，此時期基督徒欲尋求與政治上的「道統」——馬克思主義對話，實在是過於奢侈的事。政府與為政府控制的主流社會根本不會俯屈虛心，聆聽基督教這把微弱的、不合時宜的異音，何來有對話的空間？基督徒最大的關懷僅在於自我保全，就是因應外在的挑戰而不斷改造自己，使教會能繼續生存下去。他在1950年初，曾說過一段血淚交織的話：

新時代並不要求教會的改革。基督教教會的存亡，除了少數真心的基督徒之外，誰也不會掉一滴惋惜同情的眼淚！只有我們做基督徒的，曉得中國需要基督教，所以也需要基督教會，所以也需要一個革新的基督教教會。我們是為了我們這顆熱烈的愛人民、愛國家、愛人類的真心，是為了真理，是為了我們所視為至寶的信仰。我們最恨惡敷衍，最討厭滑頭，最希望徹底。我們最怕是口是心非，是出風頭而不實際的幌子。因為一切不徹底，敷衍滑頭，一切打旗號做幌子的裝腔作勢，是釘殺基督的釘子，是宣告教會死刑的文書。⁶⁰

換言之，基督教的內部改革，不是為了與新時代（新政權）正面對話，滿足它對基督教的改革要求——它根本不會覺得中國需要基督教，不會在改造中國時為基督教預留一席位；而是為了使基督教會在為政治與社會主流排擠下，能繼續存在。順著這個生存的思路，他提出了許多務實的、實務性的主張，包括主動肅清教會內部的罪惡，簡化信仰的內容，剷除宗派主義的樊籬，謀求真正的合一；又要更新信徒的靈性，增進教會的活力，發揚福音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切改造的目標都

⁵⁹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20。

⁶⁰ 趙紫宸：〈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頁2。

是指向「用愛心建立團契」。⁶¹ 這些都是教會性（教牧性）、實踐性，而非理論性的課題，與他過去二十多年來所從事的本色化神學研究取向截然不同。我們不應單從「本土神學」一語，取其字面意義，便誤會了他在此時期的神學路向。

八、被教會改造派圍剿

趙紫宸的教會改造觀純粹是教會性而非政治性的，教會必須恢復其原初的福音精神，更持守其原本的使命，成為「真正的教會」；而非與革命思潮相配合，順應社會主流，人云亦云。這與吳耀宗的教會改造思想顯然是南轅北轍的。要是趙紫宸在北平解放後，積極鼓吹基督教會必須進行徹底而全面的改造，是導致吳耀宗等起初以為趙氏與他們的想法一致，可以共同合作，故才邀請他入局的原因；那吳氏等很快便發現，他們的教會改造思想，在個別項目的內容上或許尚有雷同處，但在目標上卻完全不能接合。他們因誤會而短暫走在一起，因了解而彼此分裂。

趙紫宸與中共政府及吳耀宗等欽點改造派的蜜月期，嚴格地說，只維持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由於他對教會改造派的許多主張並不苟同，對他們所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採取抽離旁觀的態度（這是在1952年對他展開批判時所列舉的一項罪狀），故很快便遭遇政治上的困難。筆者相信，這個開始交惡的時間應在1950年中左右。

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影響下，世界基督教會協進會於1950年7月在加拿大開會時，就朝鮮半島形勢作出了一個不利中共的決議，這令一直致力推動普世合一運動、⁶² 且在1948年的世界基督教會協進會立會大

⁶¹ 趙紫宸說：「我們決不放棄因信稱義的真理，也決不否認這個真理的偏向。因信稱義是個人得救的方法，是批評一切的總理由；但是用愛心建立團契是達到真宗教真教會的方法，是改革教內一切的總鑰匙。」他之所以提到因信稱義，乃在於批評更正教在強調這個道理之餘，產生了將信仰個人主義化的偏差。趙紫宸：〈用愛心建立團契〉，收《用愛心建立團契》，頁33。

不過，必須同時指出，他許多教會改革的主張，在1949年以前其實已提出過的。譬如有關教會合一的要求。趙紫宸：《基督教會的意義》，頁13。

⁶² 他曾世界基督教會協進會成立後，歡呼這是世界基督教會歷史的一個里程碑。

會被選為六個主席之一的趙紫宸產生極大的困難。他被迫高姿態地辭去主席的職司，於7月10日在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我辭去了世界教會協進會主席之職〉的文章，宣布「完全與世界教會協進會斷絕了關係」，並且繼續發表文章，批判該會的做法，⁶³ 與該會劃清界線。

1950年12月，由於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美國宣告凍結中國在美的資金，中國政務院隨即頒布凍結美國在華資金的報復行動，教會開始面對正面的政治衝擊。此時期趙紫宸在公開的言論上，仍努力與政府及教會改造派保持一致，⁶⁴ 但他已開始面對政治上的重重壓力。

趙紫宸工作的單位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作為一所由美國教會人士創辦、主要由美國的基金支持的學府，在社會一片仇美的氣氛下，當然受到嚴重的衝擊。1951年2月12日，燕大被中央教育部正式接管為公立大學，並積極展開「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和美帝國主義侵略影響」的各種運動。⁶⁵ 而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則獨立出來，易名為燕京宗教學院，成為一所私立的宗教學院。⁶⁶

T. C. Chao, "Amsterda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Younger Churches," *Ecumenical Review* 1:2 (1949): 131.

⁶³ 趙紫宸：〈控訴世界教會協進會〉，《協進》新1卷2期（1951年7月），頁9～10；〈警告帝國主義者〉，收新華時事叢刊社編：《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北京：新華書店，1950），頁36。

⁶⁴ 趙紫宸：〈基督徒要抗美援朝〉，《天風》第10卷年終增刊（1950年12月30日），頁1；〈基督教界抗美援朝的決心〉，《真理與生命》16卷第1期（1951年3月），頁11～12。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趙紫宸在華北基督教會人士座談會上公開發言時，為基督徒之恨美帝國主義作出辯護。「我們鄙美、仇美、抗美，並不與我們宗教信仰不合。因為我們所抗的是惡勢力，是不叫人民得解放的惡勢力。」《進步日報》1951年11月29日第二張。

⁶⁵ 沈容（新華社記者）：〈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記燕京大學「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鄭笑楓：〈燕京大學的「三反運動」：進一步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罪行〉，皆刊於《協進》（1952年3月），頁39～43。另參《協進》1952年5月號的一連串報道，頁21～28。

燕京大學在1951年11月政務院通過的院校調整方案中被撤銷，工學院併入清華大學，文、理、法學院則併入北京大學。

⁶⁶ 趙紫宸：〈燕京宗教學院今後的路向〉，《恩友》第3卷第4期（1951年4月15日），頁2～3。

1951年，教會與全國一樣，陷在一片批判美帝國主義的浪潮中，控訴聲音此起彼落。趙紫宸亦不能免俗，發表文章，反對美帝武裝日本，⁶⁷ 批判燕京大學的前校長司徒雷登及世界教會協進會，也「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爪牙利用基督教進行文化侵略的罪行」。⁶⁸

在控訴運動時期，燕京宗教學院成了北京推動控訴運動的重點機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親自督師，部署了上半年時間。自1951年7月起，燕京宗教學院全院師生都得參與學習研究，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學習控訴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經過四個月漫長的準備，終於得到市宗教事務處的領導和許可，並以兩週院內完全停課來作最後預備。11月24日，於學院展開為期一天的控訴美帝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罪行大會，老師與同學們「一致憤怒地控訴美帝國主義過去毒害了學院，也毒害了他們前前後後的老師和同學們」。與會者「一致地高喊：起來，把美帝毒素清出去；徹底把燕京宗教學院革新」。在這樣的情勢下，身為院長的趙紫宸，在閉會詞中只能堅決地保證：「我們保證今後繼續不斷地對美帝國主義作鬥爭，直到打垮美帝國主義。」⁶⁹

控訴大會也許並非專以趙紫宸為針對的對象，但燕京宗教學院是政府及教會改造派一個改造的重點目標，卻是毋庸置疑的。准此，我們可以說，趙氏作為政協的代表、教會改造運動一位名義上的領頭人物，並未為他所領導的學院帶來甚麼政治屏障，政府及教會改造派對這個機構的信任程度不高。這在側面上亦反映出趙紫宸於此時期的政治行情。

趙紫宸大概抵受不了這樣的政治壓力，故多次力邀本身為軍屬、政治身分鮮明的蔣翼振出任副院長，以減卸壓力。《田家》所載的「宗教消息」有如下一段報道：

⁶⁷ 趙紫宸：〈我們要堅決反對美帝武裝日本〉，《天風》253期（1951年3月3日），頁1。

⁶⁸ 趙紫宸：〈控訴司徒雷登並世界教會協進會〉，《恩友》第3卷第6期（1951年6月15日），頁2~5。

⁶⁹ 〈京市教會展開控訴〉，《田家》（復刊）第17卷第3期（1951年12月），頁12；另參蔣翼振：〈燕京宗教學院的學習和控訴運動初步總結〉，《天風》294~295期，頁9~10。

蔣翼振教授被選為副院長——蔣教授兩年前即為軍屬，反帝愛國具足熱心，且有群眾基礎，趙紫宸院長對於蔣教授屬望殷切，聘請之時恐其不允，曾幾次下淚。茲經本院教職員公推為副院長，與趙院長同負責任，學院深慶得人。⁷⁰

為聘請一位同工而「曾幾次下淚」，又學院竟然在對外的消息中公告提到院長延聘同工時「曾幾次下淚」（不曉得是誰發布這樣的消息），這不能不教人感到詫異。趙氏在此時期所受政治壓力之大，可以想象。⁷¹

筆者相信，最多晚至1950年年中，趙紫宸便已發現他錯誤高估了政府對宗教的容忍程度，他看到由政府及其欽點領袖所推動的教會改造運動已漫天蓋地的淹至，也認識到他對教會的信念與吳耀宗等紅色基督徒無法兼容，因而轉對教會改造運動採取消極的態度。1950年7月，趙紫宸寫下了一段非常大膽的話：

我們不必大講教會的改革了。西國宣教師快要走完了，美金英鎊快要停止供給了，與普世教會的聯絡也快要減至最低限度了；教會還有甚麼可以改革的呢？教會不能再被懷疑是帝國主義可以利用的工具了，我們就不必急著去消除從帝國而來的毒素。教會的典制，遺傳，神學，教義，也沒有可以改革的，且也不是提倡改革就可以變更的……事勢所至，教會自必走上上帝所指示的道路；我們還有甚麼教會改革的事可以提倡的呢？教會不是要改革；教會乃是要得一個新的建立。⁷²

他對政府加諸教會身上的誣陷（特別是關乎帝國主義的罪狀），對吳耀宗等推動的教會改造運動所造成對教會的傷害，痛心疾首，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於是乎，他宣布改弦易轍，不再鼓吹教會改革，而此卻正好是他過去一年來所積極宣揚及推動的主題。大概他已清楚了解，他

⁷⁰ 〈燕京宗教學院新動態〉，《田家》（復刊）第17卷第3期（1951年12月），頁11。

⁷¹ 事實上，此時期基於政治上的需要，不少教會組織都得延聘一些政治上當紅的人物，以為政治過關的保證。例如恩友社原來只是幾位華北基督徒自發組成的團契，但在1950年底便邀請了吳耀宗、沈體蘭等人進入董事會，或充任顧問之職。《恩友》第3卷第1期（1951年1月15日），頁18。

⁷²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4～25。

心目中真正的教會改革，是不可能在現實的中國教會實現了，多講也是無用；如今吳耀宗等所推動的教會改造運動，完全偏離了他的教會改革的理想，他若繼續重講，只會間接幫助吳氏對教會的肆虐，所以不提也罷。自此以後，我們確實不再讀到他任何關於教會改革的言論。

他在文末提醒信徒說：

我們要準備好，要曉得教會的人數還要減之又減，教會的工作還要損之又損，要快樂地在少數人中作少數人，就是在全體信眾之中作完全負責的聖徒，要靜默地接受思想上的鬥爭，與鬥爭可能帶來的譏誚蔑視與欺侮。幾年之內，受過新教育的人要完全不了解我們，不知道我們是甚麼樣人。因此我們要作準備背負耶穌基督的十字架。⁷³

1950年7月，趙紫宸撰寫一篇長文：〈寶貝放在瓦器裡〉，呼籲「基督教在中國今天受到了嚴重的試煉」時，基督徒應該更真實地把握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穌基督，這是基督教整個的寶貝，也是放在基督徒生命這個瓦器中的寶貝。他說：

我們的責任是不要放走這瓦器裡的寶貝。我們若有這寶貝在我們的瓦器裡，就當凡事謹慎，凡事無怨無憎，凡事有希望。在今日中國的社會裡，我們好像不能發生甚麼作用，既不能在制度的改革上發生效率，復不能在流行的思想上引起變化。中國的社會好像再也用不著我們與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了。勞動生產是大家的事情，沒有教會，在這些事情上也損不了一根毫毛。社會服務是暫時的，將來政府所領導的組織都能去幹辦；教會若立刻倒塌了，國家在表面上也見不到甚麼的虧闕。但是我們知道時候要到，人人豐衣足食，諸欲俱達，人必要問人活著是為甚麼的，人的價值，意義，歸宿是甚麼，人有沒有真實性，世界有沒有歸宿，真理以甚麼為標準，道德以甚麼為根基。豐衣足食，知識滿溢之人，必要經驗到自我的孤單，人生的空虛。那時候，我們方纔有機會揭開我們的瓦器，將寶貝彰顯出來。我們今日的責任是堅守，是保存（編者按：原引文作「全」），是潛伏著的發展。⁷⁴

⁷³ 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5。

⁷⁴ 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頁9。

他認為教會暫時已再沒有於公眾社會彰顯其作用與能力的機會，基督徒當前的任務是謹守自己的信仰，在患難中不妥協不放棄，無怨無憎，靜待黎明——就是共產主義被證明無力解決人類基本問題的那一日的到臨。趙紫宸堅信，那一日必然到來。

可以看到，趙紫宸已徹底放棄了他一直嚮往的本色神學建構的努力，不再談基督信仰如何與中國文化整合、如何指導中國社會的重建；不再提教會如何自我改造，好主動且積極地迎向共產政權，繼續在主流社會作見證。當然，他也不再提基督教必須在神學研究上多所發明，好與唯物論相競爭了。在一個對基督教極其敵視的環境下，任何勝利主義 (triumphalism) 的主張都不再派用場，基督徒只能秉持受苦彌賽亞的神學，學效基督被人鄙視厭棄的榜樣，卑微地在世上存活。⁷⁵

與此同時，中共與吳耀宗等亦看到趙紫宸的異質性⁷⁶與不可挽救性，因而不留情地對他進行排斥與批判。⁷⁷

⁷⁵ 趙紫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恩友》第2卷12期（1950年12月15日），頁1~2。

⁷⁶ 丁光訓有一段借古喻今的說話頗值得細味。他以趙紫宸的遭遇為例，呼籲社會（及教會？）有「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寬容」，他指出：「趙先生並不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一位一般意義下的愛國主義者。這一種一般性質的愛國主義，有的時候是不被人放在眼裡的，甚至是不被信任、不被容忍的。這些人說百家爭鳴，但又說百家只有兩家，又說兩家裡的一家是完全錯誤的，結果只剩下一家了。趙先生愛國有心，但他這種愛國主義自然處於被排斥的地位。」丁光訓：〈更多的信任，更大的寬容——趙紫宸誕辰一百周年有感〉，《金陵神學誌》第9期（1988年11月），頁98。毫無疑問，丁氏的說法暗示了趙紫宸被由政府欽點的主流教會改造派所排斥，這也許是他之所以很快倒臺，且被嚴重批判的原因。

⁷⁷ 趙紫宸早自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便遭受到嚴重而公開的批判。作為首屆全國政協的五名基督教界代表之一，也作為中共（及吳耀宗等）最早期要拉攏及利用其名聲的教會領袖，他在這麼早的時間便已給拉下馬，顯然是極不尋常的。因為在1954年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以前，首屆全國政協是肩負著訂立憲法及全國法律的職司，也是一個有實權的國家權力機關，故連同趙紫宸在內的198位全國委員，即使不一定具有實權，亦該在政治上享有相當的地位。就算在「三反」運動中，宗教界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要在界別內揪出一個典型來，作「打老虎」的預算（參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下冊，頁728）；這個典型的選取，還必須是由政府及所屬界別的最高層直接決定的。趙紫宸一位學生劉清芬在四十多年後憶述趙被打倒時，也指出這是「意料之外的」。劉清芬：〈深切懷念和景仰趙紫宸老師〉，《金陵神學誌》第9期（1988年

趙紫宸在「三反運動」中被正式公開批判，吃了很大的苦頭。⁷⁸由於他「對美帝國主義唯命是從，奴顏婢膝，解放後保持宗教學院的美國傳統制度，對『三自』革新運動採取消極怠工的態度」，乃多番迫令他公開檢討。在確定了他的認罪態度不老實後，1952年3月10日，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召開大會，宣布他以下的罪行：「利用宗教有組織有計劃散布毒素破壞新中國；擔任世界反動宗教團體的負責人之一；身為政協代表，對政府政策陽奉陰違；抗拒破壞三自革新，甘願與敵為友；與帝國主義分子何明華、樊都生、畢範宇勾勾搭搭；與美帝分子范天祥組『前途設計委員會』，進行活動；包庇縱逃軍統特務組長梁斯璜，和教會敗類黃奎元的種種反動行為」，並撤銷他的院長職務。3月17日，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凌賢揚也公開宣布，撤銷趙紫宸執行會長職務，撤銷他在聖公會華北教區一切職務，並申請主敎院撤銷其聖職。⁷⁹他的政治與教會生涯，正式告一段落。

11月），頁97。

駱振芳在提到趙紫宸所遭受的各種迫害時，曾為政府及三自運動這樣辯護說：「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每個教會領袖都在極左路線下受到打擊，不過是打擊的面大了一些，而趙先生又是一個被打擊的重點人物而已。」駱振芳：〈趙紫宸博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金陵神學誌》第3期（1985年12月），頁34~35。

那我的問題是：在芸芸參與教會革新運動的眾教會領袖中，趙紫宸之有幸被選上為最早一位被重點打擊的人物，原因何在？作為一個頭面人物，他之被「偶然」打倒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以他在神學界及教會多年崇高的聲望，他之可以在一下子被撤銷包括燕京宗教學院及聖公會所有重要職務，亦不可能是純粹教會內部的決定，而非來自政治上的「指導」。證諸五十年代初吳耀宗與政府在教會改造運動中的各項動作與措置，我們可以確定這必然是跟吳耀宗有關的。筆者相信，趙紫宸在教會改革的看法，與吳耀宗乃至中共中央所擬訂的路線方針有嚴重的分歧；基於趙氏在教會界的名望，這些分歧構成對吳耀宗的教會改造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非以政治力量把他打倒不可。

⁷⁸ 趙紫宸語。他在1957年的鳴放運動中，表示不期望為三反運動所受的待遇尋求平反，亦沒有對政府或其他人懷恨在身；他這樣自解說：在三反運動期間，中國還在革命的過程中，對於像他這樣曾長期與帝國主義分子共事的知識分子，總是要設法確定他的政治立場的，「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是不容易的」，所以過火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趙紫宸：〈說幾句心裡的話〉，《天風》1957年13期（7月8日），頁4。

⁷⁹ 〈趙紫宸嚴重喪失立場，燕京宗教學院撤銷他院長的職務〉，《協進》（1952年6月），頁42。

自此以後，趙紫宸已完全失去在教會及社會裡的公開作用，他也不再發出任何批評政府或教會的先知聲音，⁸⁰ 只能間中為文，支持政府的政策，⁸¹ 駁斥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誹謗。⁸²

九、總結：趙紫宸在政權轉易期間的神學思考

撇開繼後的歷史發展是否如其逆料不談，孤立地看趙紫宸所作的時事分析與信仰反省，我們必得承認他是極具睿智與勇氣的時代先知。他沒有在滾滾革命洪流淹至的時候離國他去，也沒有做任何識時務的回應，改變對基督教信仰的執著，對共產主義作出讓步妥協。他反倒仍堅稱基督教真理永恆不變，並相信共產黨人不日亦會棄暗投明，叩敲教會的大門。在多數人為教外的政治壓力惶惑不安時，他沒有費神做太多對外的調解與辯護工作，卻將注意力放在教會內部的更新與復興之上。他認定上帝作為教會的主，足以保守教會渡過各樣的危難，福音本來便有克勝一切挑戰的能力；教會的真正問題來自內在的腐敗與僵化，是人為的制度與人間的罪惡，將福音原有的精神窒息了。因此，不管在何種處境，基督徒的時代任務都是安內而非攘外。趙紫宸甚至主張把一切外在的挑戰，視作內在挑戰的一個側映——這是上帝對教會的審判。他相信只要基督徒忠於所託，在行為、生活上見證基督，就無懼任何外在的政治壓力。

當然，趙紫宸並未完全無視教會在此時期所面對的政治壓力。他對共產主義既無任何幻想亦不信仰，不認為它可以與基督教兼容；他亦看到基督教在新政權下將會遭遇各樣的考驗，過去她所享受的機會和「特權」將無法保留。因此，教會必須因應時代的需要，作出大規模的自我

⁸⁰ 他在1956年一次發言中，為那些批評中國教會只有頌揚中國政府的言論、全無一點反抗、駁斥的先知聲音辯護說，由於現政府是好政府，所有設施與政策皆合乎崇高的道德原則，合乎基督教的教訓，所以教會支持政府，就是先知的聲音。《天風》第7期（1956年4月16日），頁23。

⁸¹ 如趙紫宸：〈慶祝建國十周年〉，《天風》第18期（1959年9月21日），頁11。

⁸² 如趙紫宸：〈斥美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誹謗〉，《天風》第16期（1959年8月17日），頁7~8。

調整，包括組織、教義、傳教方法及信徒生活等所有方面。對此，他一方面確信這些有待轉變的東西並非基督信仰的核心，它們都是可放棄的，並不會因失去了便影響福音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他更主張，教會與其被動的等待外來壓力強制她作轉變，不若主動地求變，進行自我反省與批判，按照時代的需要，更改福音的表達形式。簡言之，教會必須利用時代轉變的契機，推動悔改、復興與更新。

中共在接收華北的頭一年，並未按許多人所預期的，對宗教活動進行壓制或整治，因而人心較為穩定。趙紫宸乃樂觀地認為，中共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應該不會有餘力處理宗教問題，教會大概可保現狀。他更進一步設想，共產主義與基督教雖然在理論上無法兼容，卻不等於在現實上不能並存。特別是中國人乃一個實用性傾向頗強的民族，對理論的內在一致性的關懷度不高，故中共在執政後，也許會放棄過去較狂熱的革命路線，一改激烈的排他主義之態度，承認基督教過去對中國現代化所作的貢獻，甚或因應中國當前的需要而修正他們的理論，至少片斷地接受基督教的人觀與世界觀。為了保持溝通的渠道，他願意與政府合作，充任全國政協委員，參與籌劃政府及制訂《共同綱領》；他也積極推動教會內部的改革，活躍於協進會及聖公會中，並發表一連串關乎教會改革的言論。

不過，僅僅一年以後，政治風潮逆轉，他逐漸發現過去對政府之願意容忍宗教維持現狀的估算過於樂觀，並且由吳耀宗等紅色基督徒所領導的教會改造運動，亦已大大偏離了他的理想；因此宣告退出教會改革運動的領導行列，力圖在時代洪流中守護個人信仰這個最後陣地。⁸³

趙紫宸在1949年對教會的前途作出種種診斷和建言時，大概想不到中共在繼後數年後便對基督教會及他自己進行蠻橫的、不理性的迫害，

⁸³ 在他知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因著種種政治的壓力（趙紫宸說：「這些變化當然是依我們對於時勢的了解而發生的」），無法在1950年7月召開全國大會，連運作多時的籌備委員會亦被迫解散時，他感到心灰意冷，去路無多，因而說：「……話已說盡，此後我不必再寫關於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理論文字了。心勞力拙，憂思忡忡，從今以後，必須束身隨主，服從上帝的聖命，以終我的餘年。」趙紫宸：《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頁27。

綿延數十年，以致他的悲觀但積極的時代回應無法踐行；也不會想到他的許多想法和期望（諸如上帝對教會的保守，信仰必得還原為簡單的形式方能存活，政府的實用主義思想壓倒原教旨主義、容許基督教繼續存在……），要在接近半個世紀以後才一一實現；而他最不能逆料的，應是他連自己的最後陣地亦無法守住，他在晚年竟要放棄信奉了大半生的信仰呢。⁸⁴

丁光訓在英國「中國教會之友」大會上發表一篇題為〈宇宙的基督〉之演講時，曾說了兩段可圈可點的話：

我的許多同事都認為，為教會著想，只要我們在中國還有空間繼續為基督做見證，並且就許多問題的對話還能繼續下去，我們就不應該輕易以對抗和殉道作為教會的對策。

中國基督徒的經歷（按：與第三世界國家教會比較）較為獨特之處不過是：1949年中國掀起了一場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教會的革新是通過激烈的鬥爭來實現的。⁸⁵

這兩段說話中，前者堪可為趙紫宸在1949至1952年間的政治與信仰抉擇作出說明，而後者則亦側面解釋了他的教會改革的理想為何至終無法實現。前者顯示出趙紫宸是位無能者，後者反映出他的無能。

趙紫宸自知是無能者，他亦拒絕倚賴任何國內外的政治力量，單單仰賴大能的上帝。不過，因著上帝在好一段時間內緘默，沒有彰顯祂的大能；那作為無能者的他，在面對政權乃至政權扶立的教會改造派來勢洶洶的進迫時，便只好暴露出他的無能了。

⁸⁴ 雖然駱振芳等為他（也是為三自運動）辯護說，他之放棄舊的信仰，不斷作新的探求，「從廣義來講」，他仍是信的；但這總掩蓋不住一個事實，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他已公開放棄了基督教——那個具傳統及歷史意義的基督教。駱振芳：〈趙紫宸博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金陵神學誌》第3期（1985年12月），頁35。

⁸⁵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在英國「中國教會之友」大會上的演講〉，收金陵協和神學院編：《金陵神學文選（1952-1992）》（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1992），頁26～27。

撮 要

本文旨在檢視趙紫宸在1949至1951年間，就是從華北解放到他被三自會公開批判的前夕，他個人的生平與思想變化的歷程：他如何從對新政權的猜疑與不信，到有限度地與政府及其欽點以吳耀宗為首的「教會改造派」合作，再到為「教會改造派」批判；他如何從積極推動教會作自保式的改革，提倡還原主義，到最後以受苦彌賽亞作為他及其他信徒的勉勵。作者認為，趙紫宸在遭遇政治批判以前，並未對共產主義產生過憧憬，亦未曾作過任何調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理論的努力，卻只是積極地鼓吹教會自行（而非在政權指導下）進行內部改革更新，尋求在新政權下的生存空間。他的這個獨立於政府擬定的政治任務以外的目標，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惟無法實現，甚至令他無法見容於新政權，故早在1952年他便已為「教會改造派」拉下馬。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es of T.C. Chao's thought and his stance on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during 1949-1951. On his political stance: in the early of 1949, Chao still counted the new communist government as dubious and cannot be trusted. Then, he becam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ts agents within the church (i.e., the "Church Reformers" led by Y.T. Wu) in a limited extent, however, he in turn was fiercely prosecuted by the "Church Reformers" at last. On his thought of reforming Chinese churches: at first, he actively advocated the Chinese churches to perform a reform for survival under Communist sovereign, then he promoted restorationism, and finally, stressing on the suffering Messiah as a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for him and his fellow Christians under persecution.

The writer argues that Chao never has novelty on Communism, and never put forward any attempt to mediat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His proposal on church reform and revitalization wa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churches under the Communist China. Thus, as his proposal was so deviant to the political tasks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s church reform program, this proposal was deemed to be failed. Eventually, Chao himself was purged from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positions in 1952.